

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

編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三十六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

編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Journal of the 3-9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第三十六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第三十六輯 / 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25-8675-2

I. ①魏… II. ①武… III. ①中國歷史—魏晉南北朝時代—研究②中國歷史—隋唐時代—研究 IV.

①K23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89240 號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六輯)

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啓東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7.75 插頁 2 字數 326,00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675-2

K·2410 定價: 8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主編：凍國棟

編委：（以拼音字母為序）

陳明光	凍國棟	關尾史郎	郝春文	何德章
侯旭東	胡寶國	黃正建	劉安志	陸揚
羅新	妹尾達彦	孟彥弘	牟發松	氣賀澤保規
榮新江	辻正博	孫繼民	王承文	王素
魏斌	閻步克	張國剛	張榮強	佐川英治

執行編輯：朱海

目 錄

吳都建業的都城空間與葬地	張學鋒 陳 剛(1)
《三國志》列傳編纂的內在理路	曲柄睿(28)
法顯“南下向都”史事發微——兼論 4—5 世紀南北佛教律典傳譯與僧團 興替之關係	劉學軍(48)
《宋書·州郡志》斷限新考	李 偉(61)
六朝建康長干里考略	許志强(76)
北魏末期的北邊社會與六鎮之亂——以楊鈞墓誌和韓買墓誌爲 綫索	佐川英治(88)
從嵩嶽到華嶽——北朝時期北方道教中心之轉移	姜望來(108)
服制、符命與星占：中古“白衣”名號再研究	楊繼承(128)
僖宗入蜀與唐王朝的符命宣傳——《西川青羊宮碑銘》考釋	吳曉豐(163)
《典術》佚文鈎沉與考辨	李 賀(187)
《梁後略》輯考	陳 爽(197)
韓國松廣寺舊藏《金藏論》寫本及其文獻價值	王招國(定 源)(208)
試論東亞古代的“中華”與“周邊”	川本芳昭 著 劉 瑩 譯(230)
關於《唐會要》流傳的考察	古畑徹 著 李雨豐 譯 劉安志 校(251)
本輯作者工作和學習單位	(272)
稿約	(273)

Content

On the Urban Space and Burial Area of Capital City Jianye of Eastern Wu Kingdom	Zhang Xuefeng Chen Gang(1)
The Inner Logic of the <i>SanGuoZhi</i> 's Biography Compilation	Qu Bingrui(28)
The Close Analysis of Faxian's Anecdote "Go South to Jiankang" (南下向都):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Vinaya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Buddhist Groups in South & North China of 4-5 Century	Liu Xuejun(48)
The Research on the Time of the Zhou Jun Zhi (州郡志) of <i>Song Shu</i> (宋書)	Li Wei(61)
A Brief Investigation of Changganli in Capital Jiankang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Xu Zhiqiang(76)
The Society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Region and the Six Garrisons Rebellion in Late Northern Wei: Taking the Epitaph of Yang Jun and the Epitaph of Han Mai as a Clue	Sagawa Eiji(88)
From Songshan to Huashan; The Shift of the Northern Taoist Center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Jiang Wanglai(108)
Clothing System, Fuming(符命) and Astrology: The Further Study on Political Titulary of "Bai Yi" (白衣)	Yang Jicheng(128)
Xizong's Entrance into Shu Area and Tang Dynasty's Publicity of the Ordered Destiny: A Study on the Stele of Xichuan Qingyang Temple	Wu Xiaofeng(163)
The Collection of Scattered Writings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i>Dian Shu</i> (典術)	Li He(187)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i>Late Liang History</i> (梁後略)	Chen Shuang(197)
The Hand-copied Manuscript of the <i>Gold Treasure Treatise</i> (金藏論) Found in the Songgwangsa of Korea: The Text and its Value for Textual Studies	Wang Zhaoguo(Dingyuan)(208)
"China-Center" and "Periphery" in Ancient East Asia	Kawamoto Yoshiaki(Translated by Liu Ying)(230)
A Study on Circulation of <i>Tang Hui-yao</i> (唐會要)	Furuhata Toru(Translated by Li Yufeng and Revised by Liu Anzhi)(251)
List of Contributors	(272)
Note from the Editor	(273)

吳都建業的都城空間與葬地*

張學鋒 陳剛

所謂“都城圈”與“都城圈社會” ——代序言

在以往的歷史學或考古學研究中,王朝時期的都城往往被理解成由城牆圍起來的城圈空間。其實,即使在中國中世紀都城那樣有着廣袤外郭城的情況下,^①由城牆圍起來的都城依然只是狹義的都城。作為常識,單憑城牆圈內的城市空間,是無論如何也難以維持一座城市的正常運轉的,因此,近年來在城市空間的研究中導入了“都城圈”的概念,將研究的視野擴展到了都城的周邊。

“都城圈”的概念,較早由日本的中國考古學研究者提了出來。2010年,西江清高就“都城圈”問題,揭示了這樣一個觀點:城牆確實是都城的一個要素或一種功能,但與此相對,都城的各種功能,有時是超越城牆,分散在更加廣闊的“地域”空間的。因此,所謂“都城圈”,應該是涵蓋都城各種功能的一種“關係圈”。^②而對這一觀點展開具體視覺化探討的是茶谷滿關於漢魏洛陽“都城圈”的研究。^③鹽澤裕仁則將“都城圈”的概

*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基於新型超媒體 GIS 技術的城市歷史地理研究——以六朝南京為例”(41271388)、日本學術振興會平成 27 年度(2015 年度)基盤研究(A)“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都城と葬地の政治的・社会的関連に関する比較史的総合研究”。

① 所謂中國“中世紀都城”,是指始於曹魏鄴城終於隋唐長安城的都城模式,詳見張學鋒所謂“中世紀”都城》,《社會科學戰綫》2015 年第 8 期,第 71—80 頁。

② 西江清高:《歴史的「地域」としての関中平原「周原地区」》,見茶谷滿論文所引,原載《南山大学人類学博物館所蔵考古資料の研究 高蔵遺跡の研究・大須二子山古墳と地域史の研究(南山大学人類学博物館オープンリサーチセンター研究報告)》,2011 年。此處參見中村圭爾《魏晉南北朝時期「都城圈」社会研究の意図》,載國際研究集會論文集《魏晉南北朝の主要都城と都城圈社会》,阪南大學,2014 年,第 4—5 頁。

③ 茶谷滿:《後漢洛陽城の可視領域と皇帝陵との空間関係——洛陽都城圈の様相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年報 人類学研究》第 3 號,2013 年。此處參見上引中村圭爾《魏晉南北朝時期「都城圈」社会研究の意図》,第 4—5 頁。

念表述為“都城境域”。鹽澤指出,作為王朝對國家實施經營的基礎城市(大聚落)——都城,雖然有着自己獨立的地域空間,但是,“都城”一旦離開周邊的地域社會,它是否還能夠獨立運作?以往的中國都市史研究,都將重點放在由城牆包圍起來的區域(城郭)之內,缺乏將之與城郭之外的區域關聯起來的視點。然而,以都城為中心形成的遠距離流通網路,其重要性,在相對比較安定的王朝自不待言,即使是在社會動蕩的時代,作為官僚及其家族以及大量戰鬥人員集中居住的都城,缺少了來自周邊地區的物資供給,同樣也是無法正常運作的,這一點無需贅言。^①也就是說,圍繞着都城的生產主體——衛星聚落的存在,是都城正常運作不可或缺的條件。由這些衛星聚落和都城共同構成的地域空間,正是“都城”所具有的真正“境域”。在此基礎上,鹽澤認為,所謂都城,其實存在着由城郭中的小城、大城構成的“郭域”,由“郭域”之外陵墓、苑囿、郊壇等構成的“郊域”以及確保都城物資供給的衛星聚落“境域”等不同層次,都城圈實際上就是由“郭域”、“郊域”、“境域”這三個同心圓空間的擴展所構成的。

考古學者眼中的“都城圈”,更多集中在對聚落、墓葬、道路交通等遺存的考察上,強調都城圈的空間範圍,而歷史學者則似乎更多地關注這一區域內人的活動。在“都城圈”這個概念被廣泛認知以前,中村圭爾先生已經對六朝建康城與周邊地區的關係展開過多種研究,^②這些既有成果與“都城圈”概念的碰撞,形成了“都城圈社會”這一新的概念。^③

六朝都城建康的“都城圈”及“都城圈社會”問題,亦已進入研究者的視野,^④筆者亦曾基於對六朝破岡瀆的考察,就建康都城圈的“東方”展開了探討,^⑤但對建康都城圈和都城圈社會的探討遠未充分。墓葬是一個時期人類社會在地下的重要表現,通過對六

① 鹽澤裕仁:《後漢魏晉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東京:雄山閣,2013年,第1、3頁。

② 中村圭爾:《建康と水運》,載中國水利史研究會編《中國都市の歴史的研究》,1984年;《建康と三吳地方》,載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的都市と農村》,1992年;《會稽郡在六朝史上所起的作用》,載《六朝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六屆年會論文集》,1998年。後均收錄入其著《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

③ 中村圭爾:《魏晉南北朝時期「都城圈」社会研究の意図》,載國際研究集會論文集《魏晉南北朝の主要都城と都城圈社会》,第1—15頁。

④ 如前引鹽澤裕仁《後漢魏晉南北朝都城境域研究》第七章《六朝建康の都市空間》,小尾孝夫《六朝建康の墓域と都市空間》(六朝建康與都市研究研討會論文,東京大學,2011年12月)、《六朝建康都城圈的形成與江右地区》(張達志主編:《中國中古史集刊》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0—57頁)、《建康の歴史的性格と都城圈の形成》(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東洋史學專修研究室編:《中國都市論への挑動》,東京:汲古書院,2016年,第197—220頁)等。

⑤ 張學鋒:《六朝建康都城圈的東方》,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3—83頁。

朝建康周邊地區葬地及其密集程度、形制規模的探討，能够促使我們更加深入了解都城圈的形成及都城圈社會的變化等細節問題。此次，在“古代東亞都城與葬地”這一課題框架下，筆者擬就六朝建康都市空間的變化及其與葬地的互動問題展開進一步思考，充實建康都城圈、都城圈社會以及六朝歷史的基本內涵。由於該課題所涉及的時間跨度長，相關考古資料較多，故計劃分孫吳、東晉、南朝這三個階段展開，本文是其中的第一部分。

一、孫吳建都之前南京地區的縣邑與葬地

六朝都城建康（吳稱“建業”，西晉平吳後改稱“建鄴”，後避愍帝諱改稱“建康”）的中心位於今南京市區，經十餘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六朝都城、宮城的位置已基本確定。^①但兩漢時期南京地區的中心并不在今南京市區。

據《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及南京地方史志的記載，秦統一後，在今南京地區設置了江乘、秣陵二縣；西漢又分秣陵縣地置胡孰、丹陽二縣。武帝元朔二年（前128），景帝庶子江都王劉非之子劉胥行、劉將（一作“劉敢”）、劉纏（一名“劉漣”）因推恩令分別被封為胡孰侯、丹陽侯和秣陵侯。丹陽、秣陵二侯因無子嗣，不久後即除國，還為縣。胡孰侯傳兩代，除國後改為胡孰縣，東漢更名為湖熟縣。^②

江乘縣的治所，在今南京市區東北郊棲霞山南麓、九鄉河之東的南京大學仙林校區至仙林湖一帶（參見圖1）。秦漢秣陵縣治所，歷代皆按沈約《宋書·州郡志》考訂在今南京市區東南江寧區秣陵鎮附近。^③西漢武帝時從秣陵縣析置出胡孰、丹陽二侯國，其治所歷來無爭議，胡孰侯國及之後的胡孰縣、湖熟縣，治所在今江寧區湖熟鎮，丹陽侯國及之後的丹陽縣治所在今南京江寧區與安徽馬鞍山市博望區交界處的丹陽鎮。

南京地區西、北二面臨江，秦漢建置的江乘、湖熟、秣陵、丹陽四縣，從東北、東南、西

① 參見張學鋒《六朝建康城的發掘與復原的新思路》（初見《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第26—38頁；修訂稿以《六朝建康城的研究、發掘與復原》為題，載《蔣贊初先生八秩華誕頌壽紀年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第276—292頁；又見小尾孝夫譯《建康城的研究——發掘と復原》，載新宮學編《近世東アジア比較都市史の諸相》，東京：白帝社，2014年，第195—220頁）、《所謂“中世紀”都城》（《社會科學戰綫》2015年第8期，第71—80頁）及王志高《思路與方法：六朝建康城遺址考古發掘的回顧與展望》（《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後載其著《六朝建康城發掘與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頁）。

② 今南京市下轄江南的鼓樓、玄武、秦淮、建鄴、棲霞、江寧、溧水、高淳和江北的浦口、六合等10區，就兩漢和吳晉時期而言，高淳、浦口、六合因與都城關係尚不密切，故暫不列入本文的討論範圍。

③ 王志高《秦漢秣陵縣治新考》（初見《學海》2014年第5期，後載其著《六朝建康城發掘與研究》，第10—18頁）提出新說，考證秦漢秣陵縣治在今南京市區建鄴路一帶，但與諸多六朝史料不合，本文暫從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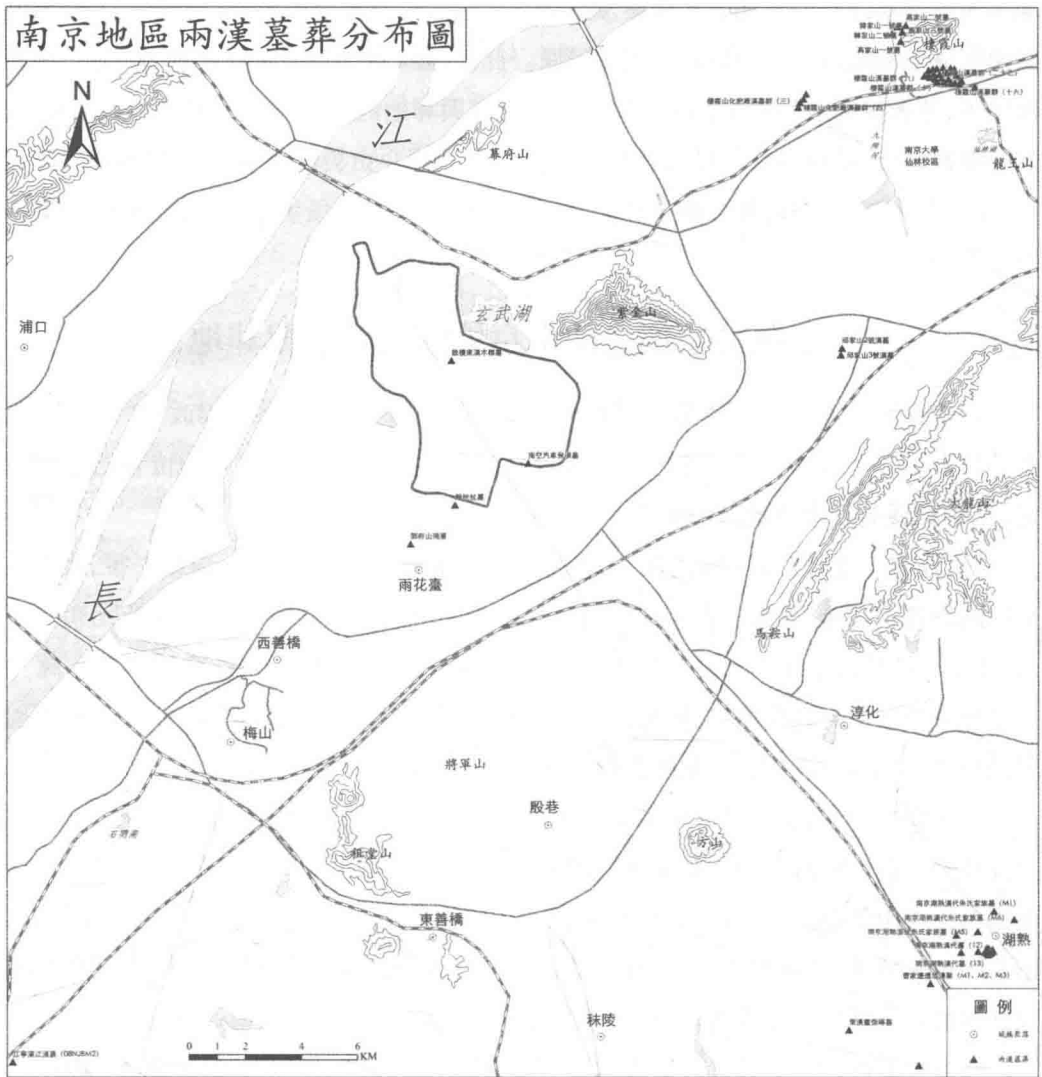


圖1 南京地區兩漢墓葬分布圖(作者繪製)

南三面環繞今南京市區,形成了一條東北→東南→西南的弧綫,這條弧綫與今南京市區,即此後的孫吳建業城、東晉南朝建康城之間尚有數十公里的距離。秦漢時期,今南京市區為秣陵縣所轄。這裏是秦淮河的入江口,爲了鎮守這一要地,傳說春秋晚期越滅吳後,在秦淮河口南岸高地上修築了越城;戰國時期楚滅越後,在秦淮河口的北岸修築了金陵邑。但與越城和金陵邑相關的記載,均見於孫吳以降,史實和附會傳說相互交駁,撲朔迷離。從下文對兩漢墓葬的分析中不難發現,與江乘、湖熟二縣相比,今南京市

區範圍內墓葬分布極少，也缺少較大型的墓葬，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南京市區并非這一地域的中心區域。

考古發現的古代遺址和墓葬，當然具有較大的偶然性。然而，當遺存數量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又不難看出其中的必然性。南京地區兩漢墓葬的分布，與上述四縣尤其是江乘、湖熟二縣的縣治所在地密切相關。

圖1“南京地區兩漢墓葬分布圖”是依據公開發表的資料繪製而成的（詳細請參照文末所附表2“南京地區兩漢吳晉墓葬統計表”，以下簡稱“統計表”）。圖中所標識出來的墓葬，是迄至2014年公開發表的資料。^①據圖所示，南京地區兩漢墓葬集中分布的區域是市區東北郊的棲霞山附近和東南郊的湖熟附近，^②這兩個地點，正是秦漢江乘、湖熟二縣的縣治所在地。

如前所述，秦漢江乘縣治在今棲霞山南麓南京大學仙林校區至仙林湖一帶。在這一區域的北部山岡地帶，分布着較多的兩漢墓葬。江乘故治附近的兩漢墓葬是南京地區兩漢墓葬最集中的地區，主要分布在三個區域。第一，棲霞山東南麓沿滬寧鐵路棲霞至龍潭之間；第二，九鄉河（秦漢六朝時稱“江乘浦”）以東的棲霞山西麓及西南麓；第三，九鄉河（江乘浦）以西今甘家巷村北。而江乘故治的東、南、西三面目前尚未發現相對集中的葬地。

第二個相對集中的地區在湖熟故治的西、北兩側。圖1標識出來的僅為已公開發表的窯上村漢墓（2座）和朱氏家族墓（6座）及曹家邊漢墓，顯得相對稀疏，但未正式發表的資料尚多。如1991年湖熟中學基建工地曾發現漢墓13座；^③1995年湖熟經濟開發區施工工地清理兩漢、六朝墓葬100餘座，^④其中兩漢墓葬的數量雖然不詳，但應該占有一定的比例。

除江乘、湖熟二縣故治附近相對集中的葬地外，秣陵、丹陽二縣故治附近發現的兩漢墓葬很少。南京市區發現的兩漢墓葬數量同樣不多。歷史上劉宋元嘉年間（424—

① 南京地區迄今已公開發表的考古資料，南京市博物館編《南京考古資料彙編》（全四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南京文物考古新發現（第三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對之做了全面彙編。本文所用資料主要來自上述兩種彙編，並參照《中國考古學年鑒》所收部分資料簡介。

② 本文所言“南京市區”，是指圖中明城牆圍起來的城市空間。

③ 姜林海、王志高：《江寧縣湖熟漢代墓地》，《中國考古學年鑒（1992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01—202頁。

④ 南京市博物館考古部資料，見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江寧區博物館《南京市湖熟鎮窯上村漢代墓葬發掘簡報》結語部分，《東南文化》2009年第4期，又見前引《南京考古資料彙編》第一冊，第479頁。

453)在建康東府城和玄武湖的建設過程中,曾發現過漢墓。^① 20世紀50年代以後,僅在今鼓樓醫院及光華門附近大光路發現過2座漢代土坑木槨墓,數量非常有限。

綜合南京地區的兩漢墓葬,按墓葬構築材料及形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5型:

I型:土坑木槨墓。如湖熟窯上村漢墓(02、03)(括弧內數字為“統計表”之序號,下同)、湖熟朱氏家族墓M1(04)、鼓樓漢墓(11)、江寧濱江漢墓(14)等。

II型:土坑石槨墓。按石槨頂部的構築材料又可分為兩類。IIa型全由石板構築,槨頂石板呈兩面坡狀,如棲霞高家山漢墓(05)、韓家山漢墓(06);IIb型槨四周用石板,頂部用木板,即所謂“木頂石槨墓”,如棲霞山漢墓(12)。

III型:木頂磚室墓。長方形磚室,頂部以木板鋪蓋,如棲霞山7號墓(12)、湖熟朱氏家族墓M2(04)。

IV型:單室磚墓。長方形磚室,券頂或疊澀頂,無甬道。如棲霞山化肥廠M1(09)、紅梅村漢墓(10)、淳化前鄭家邊漢墓(16)、龍桃杖墓(01)等。

V型:豎穴土坑墓。如湖熟朱氏家族墓M3、5、6(04)等。

就南京地區兩漢墓葬的發展演變序列而言,I型墓多為西漢至東漢初期墓葬,延續時間較長;II、III型墓處於I型土坑木槨墓向磚室墓漸進的過程中,時代屬東漢中晚期;IV型墓出現於東漢中晚期,此後成為主流。V型墓應該是時代跨度最大、數量最多的一類墓,但因腐爛迅速,保存狀態不好,見諸報告的並不多。

南京地區兩漢墓葬從土坑木槨墓經木頂石槨墓、木頂磚室墓向單室磚室墓的演變過程,與中原地區的漢墓發展序列基本一致,也與受中原墓葬影響較大的樂浪漢墓等發展序列基本一致,反映了漢代包括墓葬因素在內的中原文化因人員的流動而對周邊地區的直接影響,當然,也與這一帶土地的開發、森林面積的減少等環境因素有着相當的關聯。

綜觀迄今所見南京地區兩漢墓葬的分布,江乘、湖熟二縣治所附近的墓葬分布最密集,墓葬類型俱全,墓葬等級也相對較高,從一個側面說明二縣是兩漢時期南京地區人口相對集中、土地開發程度相對較高的地點,並且已逐漸形成了像湖熟朱氏家族那樣的地方豪族,參與到了地方政府的行政之中。^② 而秣陵、丹陽二縣以及今南京市區則相對滯後。東漢末年孫權選擇在相對滯後的今南京市區建立宮都,主要應該是出於軍事防

① 相關考述見前引王志高《秦漢秣陵縣治新考》,《六朝建康城發掘與研究》,第13—14頁。

② 參見前引張學鋒《六朝建康都城圈的東方》,《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二輯,第66頁。

衛上的考慮。

二、吳都建業的都城空間

發軔於東漢晚期的孫氏政權，其政治中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不穩定，先後經歷過會稽、吳、京口、秣陵、公安、武昌等時期，這正是孫吳政權國家體制尚未成熟、依舊處在軍國體制、軍政中心隨着戰爭需要不斷變化的表現。早在建安十六年(211)，孫權就一度將軍政中心從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區)遷至秣陵，次年還在秣陵的秦淮河入江口北岸高地上建了石頭城，并改秣陵為建業，但卻沒有在此修建宮都，而是轉戰長江中游。直至三國鼎立的局勢完全形成後的黃龍元年(229)，孫權才將都城從長江中游的武昌(今湖北鄂州市)遷到下游的建業，正式揭開了六朝都城建設的序幕。

在黃龍元年九月孫權決定遷都建業之前，這裏的居民數量有限，且大多沿秦淮水入江口而居，尤其是秦淮水南岸的大小長干，是人煙相對稠密的區域。黃龍元年十月孫權自武昌到達建業，最初利用的只是長沙桓王孫策的舊將軍府，一個遠離居民區的軍營。此後，孫氏政權在秦淮水北六七里處的空曠土地上前後建設了多座宮殿和苑囿。黃龍元年十月，“城建業太初宮居之”；“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①赤烏十年(247)春“適南宮”。^②後主孫皓寶鼎“二年夏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尤廣”。^③新宮又稱“昭明宮”。加之太初宮西的太子西園(西池)、冶城、石頭城等，孫吳時期的建業是由多所不同性質的宮殿、城壘構成的(參見圖2)，是對先秦兩漢“多宮制”的繼承。^④

如前文所述，與南京東部弧形地帶的早期開發相比，孫吳宮都建業所在的今南京市區則相對落後。春秋晚期越滅吳後，越國在今秦淮河南岸的長干里修築了越城，楚滅越後，楚國在秦淮河入江口北岸的石頭山南麓設置了金陵邑，但規模都非常小，只是控制秦淮河入江口的一種據點，兩漢時期南京市區基本上還是秣陵縣人煙稀少的鄙鄉。2007年南京市博物館在市區中華門外北宋長干寺、明報恩寺遺址的發掘過程中，清理了多座兩漢時期的墓葬，其中1號墓和2號墓為東漢晚期墓葬。2號墓出土了一件帶有建安二十四年(219)紀年的買地券，可知墓主為龍桃杖。^⑤今中華門外明報恩寺遺址

① 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錄》卷二《太祖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8、45頁。

② 《建康實錄》卷二《太祖下》，第54—55頁。

③ 《建康實錄》卷四《後主》，第98頁。

④ 參見前引張學鋒《所謂“中世紀”都城》，《社會科學戰綫》2015年第8期。

⑤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東漢建安二十四年龍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第38—44頁，又見《南京考古資料彙編》第一冊，第464—470頁。



圖 2 南京地區孫吳墓葬分布圖(作者繪製)

一帶,就是古秦淮河南岸長干里的一部分,位於越城的偏東南,是六朝時期建康人煙最密集的區域。然而,直至東漢最晚期,這一帶依然未留下較多墓葬。可見,在孫吳定都建業之前,長干里的居民依然稀少,還沒有形成像樣的大型聚落。究其原因,是這一帶位於秦淮河的入江口,潮汐的危害相對嚴重,開發相對滯後。因此,孫吳建業城的選址,更多的是出於軍事目的的考慮,是一座建立在遠離經濟發達區域、秦淮河入江口之北空曠地帶的都城。但是,作為一方的軍國中心,吳都建業宮都位置的選定、定都以後一系

列維持軍國政體正常運作的措施，給此後南京城市的發展以及人員的流動、葬地的變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三、建業周邊吳晉葬地的分布及其成因

圖2“南京地區孫吳墓葬分布圖”是據迄今公開發表的資料(參見“統計表”)繪製的示意圖。

都城地位的確立、宮都位置的確定、屯田政策的實施以及緣江防衛的重要性等因素，深刻地影響到了吳都建業周邊葬地的變動。通過對圖1“南京地區兩漢墓葬分布圖”和圖2“南京地區孫吳墓葬分布圖”的比較分析，不難看出以下一些明顯的變化。

(一) 政治中心的確立與墓葬數量的變化

因都城地位的確立，水陸運交通路綫的逐漸完善，作為孫吳政治、軍事的中心城市，建業成為人口聚集之地。聚集到這裏的人口中，有以孫吳皇帝為首的宗室成員，有服務於軍國事務的龐大的官僚系統成員，有服務於宗室、官僚階層的官府手工業從業人員，有供給都城各階層日常運營的各類人員。文獻中雖然沒有留下吳都建業有效戶口的統計資料，但我們可以從西晉平吳後太康(280—289)初年的全國戶口資料中窺見一二。西晉平吳後，以建業為中心設置丹陽郡，轄縣11個，範圍比兩漢時期的丹陽郡(西漢轄17縣，東漢轄16縣)小了不少。太康初年丹陽郡11縣總戶數為51 500戶，平均每縣約4 682戶。從絕對數量上來看，丹陽郡下轄11縣的平均戶數還不如兩漢(西漢平均6 325戶，東漢平均8 532戶)。然而，太康初年全國的戶口總數只有2 459 840戶，16 163 863口，僅為西漢最盛期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20.1%和27.1%，為東漢永平五年(140)的25.4%和32.9%，而丹陽郡戶口的保有率分別是西漢的74.1%和東漢的54.9%，遠遠高於當時的平均數。而且，太康初年全國各縣的平均戶數為2 037戶，而丹陽郡的4 682戶，僅次於西晉都城所在地洛陽河南郡及上洛郡、汲郡、河內郡等少數幾個人口大郡，與當時人口繁多的滎陽郡、河東郡、魏郡等同處第二方陣。^①且丹陽郡11縣中，在本文探討範圍內的就有7縣，主要人口應該都集中在這裏，加上不入戶籍的宗室、兵士及流動人口等等，孫吳建業的人口總數應在數十萬。西晉平吳後的太康二年

^① 以上基礎資料來自《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後漢書》志第二《郡國志四》、《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並參見梁方仲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表3、甲表4、甲表7、甲表8、甲表13、甲表1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19、24、26、38、45頁。

(281),將都城建業所在秣陵縣的西南境析置江寧縣,次年,又以秦淮水為界,水南仍為秣陵縣,水北新設建鄴縣,秦漢舊縣秣陵至此被分設為三縣。^①西晉朝廷的做法,不排除對亡國舊都分而治之的政治意圖,但人口眾多依然是析縣分置的基本理念。

人口的大量聚集,使得都城周邊的墓葬數量出現了幾何級的增加。與圖1相比,圖2顯示出來的孫吳墓葬數量呈現出了量級的增加。在建業宮都的周圍,東南部今光華門附近的高地上,繼承兩漢以來的傳統,墓葬數量有所增加。北部今幕府山南麓,開始出現較多的墓葬。建業南部遠郊的今西善橋、殷巷、江寧鎮、東山鎮等地,孫吳墓葬也大量出現,而這些區域幾乎見不到兩漢時期的墓葬。

最明顯的是建業南部的石子岡。從圖2中不難看出,以今雨花臺為中心,東西向分布着密集的吳晉墓葬,如果算上尚未發表的吳晉墓葬,其密集度會更高。而這裏在迄今公開發表的資料中還幾乎沒有發現漢墓,龍桃杖墓(01)建於建安二十四年(219),與“漢墓”關係已不大。《三國志》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稱:“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箴束其腰,投之於此岡。”^②同書卷五〇《吳書·嬪妃傳·孫休朱夫人》裴注引《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③從上引兩條史料中不難發現,石子岡上除了墳冢數量眾多之外,還是一處以平民墓葬為主的葬地。東晉初年陳郡謝鯤“假葬”於此,亦是為了日後遷葬的臨時埋葬。

(二) 屯田政策對江乘、湖熟二縣孫吳墓葬的影響

從圖2中還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變化,即兩漢墓葬相對集中的江乘、湖熟二縣治所附近幾乎沒有發現過孫吳墓葬。

孫吳定都建業後,經濟方面的困難便迎面而來,原先東部弧形地帶的既有產業無法滿足都城巨大的消費需求。為解決軍糧問題,黃武五年(226)春,孫權接受陸遜的建議,全面推開了屯田計劃。^④建業東部弧形地帶的江乘、湖熟二縣是孫吳最早的屯田地點,廢止原有的民政系統江乘令、湖熟令,改為江乘典農都尉、湖熟典農都尉,專事屯田。以後,屯田範圍進一步擴大,先後在於湖(治今安徽當塗,即漢代丹陽縣境內)設督農校

① 《晉書》卷一五《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59—460頁。

② 《三國志》卷六四《吳書·諸葛恪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41頁。

③ 《三國志》卷五〇《吳書·嬪妃傳·孫休朱夫人》,第1201頁。

④ 《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孫權傳》,第1131頁。

尉，在溧陽（治今江蘇溧陽西南）設屯田都尉，屯田區域不斷擴大。

孫吳屯田的具體管理模式不是很清楚，但從廢縣令改設典農都尉這個變化上不難看出，孫吳的屯田是以軍屯為主。孫吳在赤烏八年（245）八月下令開鑿破岡瀆，“遣校尉陳勛，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①工程的負責人及參與者似乎都是屯田官兵。許嵩《建康實錄》卷二《太祖下》赤烏八年條的記載更為詳細：“使校尉陳勛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岡瀆，上下一十四埭，通會市，作邸閣。”^②而破岡瀆十四埭的下七埭正在當時的湖熟典農都尉轄區內。^③在實行屯田的過程中，湖熟一帶的地方豪族及其依附人口或者自耕農民，是否被轉移到了別處？當地土著人口大量減少，而屯田將士死後不太會葬在當地，這些是否都是造成湖熟附近缺少孫吳墓葬的原因之一，這種可能性似乎無法完全排除。

江乘縣的情況與之相類。江乘浦（今九鄉河）以東地區幾乎沒有發現過孫吳墓葬，這一帶或許就是江乘典農都尉的主要屯區，居民似乎也被遷往他處。被遷徙的江乘縣民有一部分被安置在了江乘浦以西原本空曠的地帶，甘家巷北部一帶留下較多的孫吳墓葬或許與他們有關，這片葬地的使用一直延續到兩晉南朝時期。

（三）沿江地帶戰略地位的提高與孫吳墓葬的分布

如前所述，孫吳定都建業主要是出於軍事防守的目的。孫吳與曹魏在皖口、濡須口、赤壁，與蜀漢在夏口、夷陵等地的戰爭，以及西晉平吳的戰爭，都發生在建業的上游，因此，沿江防範來自建業上游的軍事威脅，對孫吳而言至關重要。

由於當時的江面非常寬闊，因此自上游而來的軍旅商船，必須進入長江支流才能靠岸停泊。建業之所以選擇秦漢秣陵縣的鄙鄉建設官都，原因就是這裏是長江下游最大支流秦淮河（古稱“龍藏浦”）的入江處。秦淮的入江口南北是高地山丘，孫吳在此修建石頭城，設置了石頭戍和石頭津，牢牢掌控着來自上游的船隻。其實，建業的上下游，這樣的支流不止秦淮河一條，從上游的于湖（今安徽馬鞍山當塗縣）往下，著名的有牛渚、江寧浦、新林浦、查浦、蟹浦、江乘浦等，在這些支流與長江的交匯口，前後形成了牛渚營（采石戍）、江寧縣治、新亭壘、白下城、江乘縣治等沿江要衝。

① 《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孫權傳》，第1146頁。

② 《建康實錄》卷二《太祖下》，第53頁。

③ 參見前引張學鋒《六朝建康都城圈的東方》，《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二輯，第69—72頁。